

论王蒙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之间的矛盾

张 睿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初,王蒙的基本文学主张是强调创作题材的现实性、重大性和思想情绪的积极、乐观,但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意识流”系列短篇小说所隐含的主题却是对现实的深刻质疑与困惑。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面对走向“失重”的文学,王蒙率先提出要“重建理想”,而他自己的小说却充满了戏谑嘲弄和语言的狂欢。王蒙的这种批评与创作之间的错位与矛盾,对于思考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有某种借鉴意义。

[关键词] 王蒙;文学批评;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21(2010)01-0027-03

20 世纪 80 年代是王蒙文学生涯的一段黄金时期,他不仅凭借小说创作上的创新、多变赢得文坛的瞩目,还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成为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将王蒙的文学批评与其小说创作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二者的主导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其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之间呈现出一种矛盾和分裂的状态。批评家陈晓明称王蒙的创作为“胜过现实”的写作,他指出,王蒙这样一个主流作家其实是一直在凭借个人记忆,从他特定的个人视角来写作,他的视角与主流思想意识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这使得他与现实/历史构成了一种超越性的紧张关系。反观王蒙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文学批评始终是与主流思想保持一致的,这就形成了王蒙文学批评与其小说创作之间有着深长意味的矛盾与裂痕。

一、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文革”之后复出的王蒙,在文学批评方面积极参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代任务中,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以支持其文学的探索创新,如批“纪要”,关于“歌德”与“缺德”,关于异化论与人道主义等等。王蒙在这些讨论中的观点中规中矩,辩证而稳妥,与主流思想完全同步。如关于“歌德”与“缺德”,他提出“生活中的矛盾、消极面,这是客观的存在”,那些“歌德派”的主张只会让文学“重新走上粉饰生活和伪造生活的绝路”。同时他又提出“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者”,认为在看到伤痕的同时也要看到人们的斗争和希望,“怎么能说是漆黑一团呢?怎么能搞那种单色一抹黑的唯揭露文学呢?”

这一时期王蒙基本的文学主张,一是要紧跟现实的脚步,写重大现实题材;二是作品的思想要积极、乐观,能够鼓舞人、教育人。以此为标准,王蒙发表了一系列的作家、作品评论文章。如对于《火红的云霞》这样有明显艺术缺陷的作品,王蒙认为因其“反映现实的及时性——它写了工业调整中的人的命运冲突——使人们不能不对它艺术上的某些不足抱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另两篇有“刻意为之的编造和堆砌的痕迹”的作品,王蒙也因为其宣扬了“理想的力量,善的力量”、“致力于塑造正面的与理想的形象”对它们表示赞赏。而对于一些“过于夸大渲染了年轻人苦闷、失意的一面,因而通篇弥漫着一种过分灰暗的色调”的作品,王蒙则表示了不满。如对于王安忆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几篇作品,王蒙在对作品里的“悲凉和疑惑”表示理解的同时,又指出她虽然主观上“并没有忽视报道生活里的温暖”,但“她写得最弱的恰恰是这一面”。王蒙一方面不反对揭露矛盾和伤痕,一方面又主张作品还要“报道生活里的温暖”,要给人以鼓舞和安慰,这源于他这一时期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要求文学干预人的灵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观。

作为新时期最敏锐的文学家,王蒙复出后的创作

[收稿日期] 2009-12-04

[作者简介] 张睿(1977-),男,河南西平人,牡丹江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学批评学。

[基金项目] 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术科技创新项目重点项目(yjsxscx 2009-11m djnu)

延续了他20世纪50年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怀疑精神。从1978年到1980年,王蒙发表了一系列“意识流”短篇小说,如《夜的眼》、《春之声》、《布礼》、《海的梦》、《蝴蝶》等,因其形式的新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这些作品的主题,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文革”结束后当权者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官僚主义问题是王蒙重点关注的。《蝴蝶》是王蒙这一时期“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主人公张思远坐在吉普车上的心理活动回顾了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感觉似真似梦恍惚不定,犹如“庄生梦蝶”,这恍惚的感觉显示了对现实的犹疑。历史小说中已经身为副部长的张思远想与仍然留在农村的秋文结婚却遭拒绝,这一情节安排意味深长。秋文在拒绝了张思远之后说:“别忘记我们!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一切政治问题都解决了,王蒙对此是深以为虑的,他在怀疑和发掘两者发生隔膜的可能性。这样的主题在当时可以说是空谷足音,在控诉“文革”和欢呼新时期的大合唱中,王蒙的声音是另类的,这反映了他身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敏锐和清醒。

当然,王蒙的作品里也从不缺乏光明的因素。《春之声》里牵引破旧的闷罐子车厢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车上还有一位抱着小孩学德语的年轻母亲,这些都是有着十足的象征意味的描述。《布礼》、《蝴蝶》等也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尽管作品中的主人公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有过种种矛盾、痛苦乃至绝望的复杂心理活动,但最后他们仍然恢复了信念,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钟亦成在平反后感叹:“二十多年的学费没有白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但这种希望和乐观是不那么让人信服的,用评论家吴炫的话来说这种对信念的忠诚和乐观是缺乏理性支撑的“一厢情愿”。“与其说王蒙和他笔下的钟亦成是在‘坚信’党会纠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不如说是他们在‘祝愿’党在一早上就恢复她健康的肌体——因为前者有理性支撑,后者只是一种审美理想。”因而这种乐观和忠诚只是停留在主观愿望的层面上,其对于社会实际的有效性是让人怀疑的。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越来越多的强调文

艺的非功利性,反对搞“应时文学”和将文学变成“社会学材料”的主张,王蒙则不屈不挠地为文学的“社会性”进行辩护。1985年他明确提出“社会性不是文学之累”,进而指出:“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文学的认识意义与教化功能,文学家的社会使命意识,却是一个无时无处不在起作用的、意义重大的威严的历史与现实。”1987年王蒙提出“文学三元”说,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生命现象和文化现象,具有多元性质,但仍然强调“将文学的社会性放在优先地位”。1988年在敏感地注意到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在走向自由的同时却又进入了“失重”状态之后,王蒙提出了重建价值观的问题。对此,他提出了真实性、深刻性、创造性、审美性等价值标准。关于文艺的思想性问题,王蒙在否定了“极左”时期假大空的思想性的同时,提出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历史的进取精神等思想性标准,呼吁“重建理想!这是我们的文艺家的神圣使命”,“使我们在自由起来的同时重新亲切起来热烈起来与崇高起来”。

但是在同一时期,即1985至1988年,王蒙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如《冬天的话题》、《来劲》、《一嚏千娇》、《十字架上》、《球星奇遇记》等,却呈现出与他的上述理论主张迥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些小说里,看不到多少“理想”与“崇高”的因素,而是充满了不加节制的戏谑嘲弄和让人瞠目的语言修辞游戏。正像评论家陈晓明评价王蒙这一时期的创作时所说的,“他把先前的老辣和幽默变成语言策反的游戏,把他那一向认真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和焦点问题的叙述,变成东拉西扯、指桑骂槐的文体。”他把各种不同性质的语言词汇混杂在一起,在尽情嘲弄现实的同时也毫无顾虑地玩弄着语言。王蒙的小说叙述成了一种无节制的极端化、狂欢化的语言表演,制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的奇观效应。

联系20世纪90年代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可以发现这不是王蒙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标志着王蒙小说创作的一个转向,即“语言,越来越成为王蒙的重要依恃”,语言的狂欢成为王蒙小说文体的重要特征。王蒙的这种带有明显游戏性质的“狂欢体”写作,一方面与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有关,这一时期王蒙官居高位,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受到诸多限制,而他又对艺术创新有着强烈的兴趣,于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成为很自然的选择。此外,这种冷嘲热讽和“指桑骂槐”的书写方式也与他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

关,“因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隐秘焦虑,王蒙不得不插科打诨,希望在规避、插科打诨、有分寸的讽刺中委婉地表达反抗的意志”。从这一方面来看,王蒙的这些作品并没有规避现实,也不全是没有主题的游戏之作。这些夸大其词的冷嘲热讽可以看作是一种拐弯抹角的政治评论和有针对性的现代寓言。但是,在其汪洋恣肆、不加节制的语言狂潮下,小说的主题几乎被淹没不见了。对于现实,“这些隐晦的政治隐喻或寓言还是太脆弱了,它甚至不如前期的意识流式的政治无意识的表露。”

王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有着无法摆脱的政治色彩,这既是时代特征的体现,也与王蒙的个人经历有关。有着 14 岁入党的“少共”经历,“文革”结束后又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王蒙对于新时期文学充满了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他自觉地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去要求文学,去宣扬和贯彻既定的理论和政策。同时,王蒙又是位优秀的文学家,是对生活诚实的观察者,他的创作是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出发,表达最真切的现实感受。所以他的小说创作能时时逸出理论的规范之外,造成他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 陈晓明.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J]. 河北学

刊, 2004, (5).

[2] 王蒙. 文学与安定团结[C]. 王蒙文存第 23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32, 33

[3] 王蒙. 为了更加成熟的文学[C]. 王蒙文存第 23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75

[4] 王蒙. 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C]. 王蒙文存第 22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61, 63

[5] 王蒙. 文学现状断想[C]. 王蒙文存第 23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97.

[6] 王蒙. 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C]. 王蒙文存第 22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37— 38

[7] 王蒙. 蝴蝶[J]. 十月, 1980, (4).

[8] 王蒙. 布礼[J]. 当代, 1979, (4).

[9] 吴炫. 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89

[10] 王蒙. 学文偶拾[C]. 王蒙文存第 23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135, 136.

[11] 王蒙. 自由与失重[C]. 王蒙文存第 23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191, 195

[12] 郜元宝. 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 (2).

[13] 李广仓. 焦虑与游戏:王蒙创作心理阐释[J]. 钟山, 1997, (5).

[责任编辑] 心安